

卷二

华盖集续编

4

出版说明

本书收杂文三十三篇。前二十六篇于一九二六年作于北京；后六篇作于厦门；另《海上通信》一篇。一九二七年北京北新书局初版，此后印行的版本都和初版相同。

218
华盖集续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字数136,000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7 插页2

1980年7月北京第1版 1980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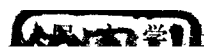
印数：00,001—10,000

书号10019·2987

定价0.67元

卷二

华盖集续编

 学出版社
北京

小 引⁽¹⁾

还不满一整年，所写的杂感的分量，已有去年一年的那么多了。秋来住在海边，目前只见云水，听到的多是风涛声，几乎和社会隔绝。如果环境没有改变，大概今年不见得再有什么废话了罢。灯下无事，便将旧稿編集起来；还豫备付印，以供给要看我的杂感的主顾们。

这里面所讲的仍然并没有宇宙的奥义和人生的真谛。不过是，将我所遇到的，所想到的，所要说的，一任它怎样浅薄，怎样偏激，有时便都用笔写了下来。说得自夸一点，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那时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现在更不想和谁去抢夺所谓公理或正义。你要那样，我偏要这样是有的；偏不遵命，偏不磕头是有的；偏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拨它一拨也是有的，此外却毫无什么大举。名副其实，“杂感”而已。

从一月以来的，大略都在内了；只删去了一篇⁽²⁾。那是因为其中开列着许多人，未曾，也不易遍征同意，所以不好擅自发表。

书名呢？年月是改了，情形却依旧，就还叫《华盖集》。然而年月究竟是改了，因此只得添上两个字：“续编”。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四日，鲁迅记于厦门。

注 释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北京《语丝》周刊第一〇四期。

〔2〕 指《大衍发微》，后收入《而已集》作附录。

目 录

一九二六年

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	1
有趣的消息.....	13
学界的三魂.....	23
古书与白话.....	30
一点比喻.....	34
不是信.....	38
我还不能“带住”.....	59
送灶日漫笔.....	64
谈皇帝.....	69
无花的蔷薇.....	72
无花的蔷薇之二.....	78
“死地”.....	83
可惨与可笑.....	86
纪念刘和珍君.....	90
空谈.....	96
如此“讨赤”.....	101
无花的蔷薇之三.....	103
新的蔷薇.....	108

再来一次	114
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	120
马上日记	125
马上支日记	138
马上日记之二	158
记“发薪”	165
记谈话	171
上海通信	177

续 编 的 续 编

厦门通信	185
厦门通信(二)	189
《阿Q正传》的成因	192
关于《三藏取经记》等	201
所谓“思想界先驱者”鲁迅启事	207
厦门通信(三)	209
海上通信	214

随感录三十五¹

(一九一八年)

从清朝末年，直到现在，常常听人说“保存国粹”²这句话。

前清末年说这话的人，大约有两种：一是爱国志士³，一是出洋游历的大官⁴。他们在这题目的背后，各各藏着别的意思。志士说保存国粹，是光复旧物⁵的意思；大官说保存国粹，是教留学生不要去剪辫子的意思。

现在成了民国了。以上所说的两个问题，已经完全消灭。所以我不能知道现在说这话的是那一流人，这话的背后藏着什么意思了。

可是保存国粹的正面意思，我也不懂。

什么叫“国粹”？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的事物了。换一句话，便是特别的东西。但特别未必定是好，何以应该保存？

譬如一个人，脸上长了一个瘤，额上肿出一颗疮，的确是与众不同，显出他特别的样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据我看来，还不如将这“粹”割去了，同别人一样的好。

倘说：中国的国粹，特别而且好；又何以现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⁶摇头，旧派⁷也叹气。

有作为，请酒开会，维持张龙，或否认赵虎，^[6]那自然是颇近于管闲事了。然而火星上事，既然能够“知道”，则至少必须已经可以通信，关系也密切起来，算不得闲事了。因为既能通信，也许将来就能交通，他们终于会在我们的头顶上打架。至于咱们地球之上，即无论那一处，事事都和我们相关，然而竟不管者，或因不知道，或因管不着，非以其“闲”也。譬如英国有刘千昭雇了爱尔兰老妈子在伦敦拉出女生，^[7]在我们是闲事似的罢，其实并不，也会影响到我们这里来。留学生不是多多，多多了么？倘有合宜之处，就要引以为例，正如在文学上的引用什么莎士比亚呀，塞文狄斯呀，芮恩施^[8]呀一般。

（不对，错了。芮恩施是美国的驻华公使，不是文学家。我大约因为在讲什么文艺学术的一篇论文上见过他的名字，所以一不小心便带出来了。合即订正于此，尚希读者谅之。）

即使是动物，也怎能和我们不相干？青蝇的脚上有一个霍乱菌，蚊子的唾沫里有两个疟疾菌，就说不定会钻进谁的血里去。管到“邻猫生子”^[9]，很有人以为笑谈，其实却正与自己大有相关。譬如我的院子里，现在就有四匹邻猫常常吵架了，倘使这些太太们之一又诞育四匹，则三四月后，我就得常听到八匹猫们常常吵闹，比现在加倍地心烦。

所以我就有了一种偏见，以为天下本无所谓闲事，只因为没有这许多遍管的精神和力量，于是便只好抓一点来管。为什么独抓这一点呢？自然是最和自己相关的，大则因为同是人类，或是同类，同志；小则，因为是同学，亲戚，同

乡，——至少，也大概叨光过什么，虽然自己的显在意识上并不了然，或者其实了然，而故意装痴作傻。

但陈源教授据说是去年却管了闲事了，要是我上文所说的并不错，那就确是一个超人。今年不问世事，也委实是可惜之至，真是斯人不管，“如苍生何”^{〔10〕}了。幸而阴历的过年又快到了，除夕的亥时一过，也许又可望心回意转的罢。

2

昨天下午我从沙滩^{〔11〕}回家的时候，知道大琦^{〔12〕}君来访过我了。这使我很高兴，因为我是猜想他进了病院的了，现在知道并没有。而尤其使我高兴的是他还留赠我一本《现代评论增刊》，只要一看见封面上画着的一枝细长的蜡烛，便明白这是光明之象，更何况还有许多名人学者的著作，更何况其中还有陈源教授的一篇《做学问的工具》呢？这是正论，至少可以赛过“闲话”的；至少，是我觉得赛过“闲话”，因为它给了我许多东西。

我现在才知道南池子的“政治学会图书馆”去年“因为时局的关系，借书的成绩长进了三至七倍”了，但他“家翰笙”^{〔13〕}却还“用‘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十个字形容当今学术界大部分的状况”。这很改正了我许多误解。我先已说过，现在的留学生是多多，多多了，但我总疑心他们大部分是在外国租了房子，关起门来燉牛肉吃的，而且在东京实在也看见过。那时我想：燉牛肉吃，在中国就可以，何必路远迢迢，跑到外国来呢？虽然外国讲究畜牧，或者肉里面的寄

生虫可以少些，但腐烂了，即使多也就没有关系。所以，我看见回国的学者，头两年穿洋服，后来穿皮袍，昂头而走的，总疑心他是在外国亲手燉过几年牛肉的人物，而且即使有了什么事，连“佛脚”也未必肯抱的。现在知道并不然，至少是“留学欧美归国的人”并不然。但可惜中国的图书馆里的书太少了，据说北京“三十多个大学，不论国立私立，还不及我们私人的书多”云。这“我们”里面，据说第一要数“溥仪先生的教师庄士敦^[14]先生”，第二大概是“孤桐先生”即章士钊^[15]，因为在德国柏林时候，陈源教授就亲眼看见他两间屋里“几乎满床满架满桌满地，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德文书”。^[16]现在呢，想来一定是更多的了。这真教我欣羡佩服。记得自己留学时候，官费每月三十六元，支付衣食学费之外，简直没有赢余，混了几年，所有的书连一壁也遮不满，而且还是杂书，并非专而又专，如“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德文书”之类。

但是很可惜，据说当民众“再毁”这位“孤桐先生”的“寒家”时，“好像他们夫妇两位的藏书都散失了”。想那时一定是拉了几十车，向各处走散，可惜我没有去看，否则倒也是一个壮观。

所以“暴民”之为“正人君子”所深恶痛绝，也实在有理由，即如这回之“散失”了“孤桐先生”夫妇的藏书，其加于中国的损失，就在毁坏了三十多个国立及私立大学的图书馆之上。和这一比较，刘百昭^[17]司长的失少了家藏的公款八千元，要算小事件了，但我们所引为遗憾的是偏是章士钊刘百昭有这么多的储藏，而这些储藏偏又全都遭了劫。

在幼小时候曾有一个老于世故的长辈告诫过我：你不要和没出息的担子或摊子为难，他会自己摔了，却诬赖你，说不清，也赔不完。这话于我似乎到现在还有影响，我新年去逛火神庙^[18]的庙会时，总不敢挤近玉器摊去，即使它不过摆着寥寥的几件。怕的是一不小心，将它碰倒了，或者摔碎了一两件，就要变成宝贝，一辈子赔不完，那罪孽之重，会在毁坏一座博物馆之上。而且推而广之，连热闹场中也不大去了，那一回的示威运动时，虽有“打落门牙”^[19]的“流言”，其实却躺在家里，托福无恙。但那两屋子“关于社会主义的德文书”以及其他从“孤桐先生”府上陆续散出的壮观，却也因此“交臂失之”^[20]了。这实在也就是所谓“有一利必有一弊”，无法两全的。

现在是收藏洋书之富，私人要数庄士敦先生，公团要推“政治学会图书馆”了，只可惜一个是外国人，一个是靠着美国公使芮恩施竭力提倡出来的^[21]。“北京国立图书馆”将要扩张，实在是再好没有的事，但听说所依靠的还是美国退还的赔款^[22]，常年经费又不过三万元，每月二千余。要用美国的赔款，也是非同小可的事，第一，馆长就必须学贯中西，世界闻名的学者。据说，这自然只有梁启超^[23]先生了，但可惜西学不大贯，所以配上一个北大教授李四光^[24]先生做副馆长，凑成一个中外兼通的完人。然而两位的薪水每月就要一千多，所以此后也似乎不大能够多买书籍。这也就是所谓“有利必有弊”罢，想到这里，我们就更不能不痛切地感到“孤桐先生”独力购置的几房子好书惨遭散失之可惜了。

总之，在近几年中，是未必能有较好的“做学问的工具”的，学者要用功，只好是自己买书读，但又没有钱。听说“孤桐先生”倒是想到了这一节，曾经发表过文章，然而下台了，很可惜。^[25]学者们另外还有什么法子呢，自然“也难怪他们除了说说‘闲话’便没有什么可干”，虽然北京三十多个大学还不及他们“私人的书多”。为什么呢？要知道做学问不是容易事，“也许一个小小的题目得参考百十种书”；连“孤桐先生”的藏书也未必够用。陈源教授就举着一个例：“就以‘四书’^[26]来说”罢，“不研究汉宋明清许多儒家的注疏理论，‘四书’的真正意义是不易领会的。短短的一部‘四书’，如果细细的研究起来，就得用得了几百几千种参考书”。

这就足见“学问之道，浩如烟海”了，那“短短的一部‘四书’”，我是读过的，至于汉人的“四书”注疏或理论，却连听也没有听到过。陈源教授所推许为“那样提倡风雅的封藩大臣”之一张之洞先生在做给“束发小生”们看的《书目答问》上曾经说：“‘四书’，南宋以后之名。”^[27]我向来就相信他的话，此后翻翻《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28]之类，也只有“五经”，“六经”，“七经”，“六艺”，^[29]却没有“四书”，更何况汉人所做的注疏和理论。但我所参考的，自然不过是通常书，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就有，见闻寡陋，也未可知，然而也只得这样就算了，因为即使要“抱”，却连“佛脚”都没有。由此想来，那能“抱佛脚”的，肯“抱佛脚”的，的确还是真正的福人，真正的学者了。他“家翰笙”还慨乎言之，大约是“《春秋》责备贤者”^[30]之意罢。

完

现在不高兴写下去了，只好就此完结。总之：将《现代评论增刊》略翻一遍，就觉得五光十色，正如看见有一回广告上所开列的作者的名单。例如李仲揆教授的《生命的研究》呀，胡适^[31]教授的《译诗三首》呀，徐志摩^[32]先生的译诗一首呀，西林^[33]氏的《压迫》呀，陶孟和^[34]教授的要到二〇二五年才发表而必须我们的玄孙才能全部拜读的大著作的一部分呀……。但是，翻下去时，不知怎的我的眼睛却看见灰色了，于是乎抛开。

现在的小学生就能玩七色板，将七种颜色涂在圆板上，停着的时候，是好看的，一转，便变成灰色，——本该是白色的罢，可是涂得不得法，变成灰色了。收罗许多著名学者的大著作的大报，自然是光怪陆离，但也是转不得，转一周，就不免要显出灰色来，虽然也许这倒正是它的特色。

一月三日。

注 释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八日《语丝》周刊第六十二期。

〔2〕 陈源(1896—1970) 字通伯，笔名西滢，江苏无锡人。现代评论派的主要成员。曾留学英国，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

〔3〕 《现代评论》 综合性周刊，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创刊于北京，一九二七年七月移至上海，一九二八年底出至第九卷第二〇九期停刊。主要撰稿人有胡适、陈西滢、王世杰、唐有壬、徐志摩等，这些人当时被称为“现代评论派”。他们依附北洋政府，后来转而投靠蒋介石。

石政权。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六期(一九二六年一月二日)发表的《闲话》中称:“我们新年的决心,不如就说以后永远的不管人家的闲事吧。”因为,据他说,“中国爱管闲事的人太少”,所以像他这样爱“代人抱不平”,遇到“许多看不过眼的事情,不得不说两句话”的人,“就常常惹了祸了”。这是他为自己前一年帮助章士钊和杨荫榆压迫学生的种种言行所作的辩护。

〔4〕“可惜” 此语原为陈西滢对于鲁迅等七教员关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的讥评。陈在《现代评论》第一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发表的《闲话》中说:“这个宣言语气措词,我们看来,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大公允,看文中最精彩的几句就知道了。……这是很可惜的。”

〔5〕五色旗 民国成立后至一九二七年这一时期旧中国的国旗,红黄蓝白黑五色横列,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

〔6〕 在女师大风潮中,杨荫榆曾一再利用宴会方式,拉拢教员,策划压迫学生。在章士钊解散女师大另办女子大学后,女师大进步师生另在宗帽胡同租屋上课,后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三十日返回原校址复校。十二月十四日,女子大学也用宴会方式宴请所谓“教育界名流”。陈西滢、王世杰、燕树棠等人在席上成立所谓“教育界公理维持会”(次日改名“国立女子大学后援会”),于十二月十六日在《致北京国立各校教职员联席会议函》中攻击女师大进步师生说:“同人等以为女师大应否恢复,目的如何,另属一问题,而少数人此种横暴行为,理应在道德上加以切实否认。”这里就是针对他们而发。

〔7〕 一九二五年八月,章士钊决定在女师大校址另立女子大学,十九日派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前往筹备。刘于二十二日在军警配合下雇用流氓和老妈子殴打学生出校。这里是对此事的讽刺。

〔8〕 莎士比亚(W. Shakespeare, 1564—1616) 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英国戏剧家、诗人,著有剧本《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仲夏夜之梦》等三十七种。塞文狄斯(Miguel de Cervantes, 1547—1616),通译塞万提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堂吉珂德》等。芮恩施(P. S. Reinsch),民国初年美国驻华公使。罗家伦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一九一九年一月)发表的《今日

中国之小说界》内，曾引芮恩施的话来作为“外国人之中国人译外国小说观”的论据；并称他“是美国一位很大的学者”。这里所说“因为在讲什么文艺学术的一篇论文上见过他的名字”，即指罗家伦的这篇论文。

〔9〕“邻猫生子” 指梁启超在《中国史界革命案》中引英国斯宾塞的话：“或有告者曰：邻家之猫，昨日产一子，以云事实，诚事实也；然谁不知为无用之事实乎？何也？以其与他事毫无关涉，于吾人生活上之行为，毫无影响也。”

〔10〕“如苍生何” 语见《世说新语·排调》：谢安“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按谢安的字）不肯出，将如苍生何！”后人常用的“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一语即由此而来。

〔11〕沙潭 北京地名，当时北京大学第一院所在地。下文的南池子，也是北京地名。

〔12〕大琦 即王品青，河南济源人。北京大学毕业。《语丝》撰稿人。曾任北京孔德学校教员。

〔13〕他“家翰笙” 指陈翰笙，江苏无锡人。社会学家，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他曾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发表《临时抱佛脚》一文，说北京政治学会图书馆藏书在一万册以上，“会员里十九是留学欧美归国的人”；他根据馆内借书统计表，指出一九二五年因有“沪案（按即五卅惨案）和关会（按即关税会议）两个热闹的时务题目”，借书的人数较前一年大为增多；因而他用“临时抱佛脚”这句俗谚来形容当时学术界大部分人平时的“懒惰”。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一周年纪念增刊》（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发表《做学问的工具》一文中引用陈翰笙的话时，称他为“‘吾家’翰笙”。

〔14〕溥仪 爱新觉罗溥仪（1907—1967），即清朝最后的皇帝宣统。庄士敦（1874—1938），英国人。曾任威海卫“英国租借地行政长官”，一九一九年起，任溥仪的英文教师，以后即长期和溥仪保持密切关系。一九二四年春夏间，曾与金梁、康有为等密谋复辟；同年十一月溥仪被逐出宫后，他又与郑孝胥等于十二月护送溥仪逃往日本使馆，是个长期在我国从事阴谋活动的帝国主义分子。

〔15〕 章士钊(1881—1973) 字行严，湖南长沙人。他早年署名青桐，后改秋桐，自一九二五年七月创办《甲寅》周刊时起，又改署孤桐(见《甲寅》周刊第一号《字说》)。陈西滢在文章中常亲昵地称他为“孤桐先生”。

〔16〕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民众为要求关税自主和反对段祺瑞政府举行示威游行。群众对于段祺瑞和平日依附他的一批政客如章士钊、朱深等人深为愤恨，游行时曾到他们的住宅示威；事后，章士钊即写了一篇《寒家再毁记》(按同年五月七日，因章士钊禁止学生纪念国耻，学生曾赴章宅质问，发生冲突，因此他称这次为“再毁”)，说他“家中所有。以中西书籍为第一项。……西籍为愚历年续续购办。哲学政计诸门差完。……最后一批。乃两年前在柏林所得。甚称富有。”又说当日群众“一拥而入。遇物即毁。……自插架以至案陈。凡书之属无完者。”(见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五日《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二十一号)接着，陈西滢在《做学问的工具》一文里又附和说：“孤桐先生在英国德国买的书是我亲自看见的。他柏林寓中两间屋，几乎满床满架满桌满地，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德文书。我不知道这些书都在北京否。从《寒家再毁记》看来，好像他们夫妇两位的藏书都散失了。这真是很可惜的。”

〔17〕 刘百昭 湖南武冈人。章士钊的亲信之一，在章任教育总长时期任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兼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校长。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北京民众因要求关税自主示威游行时，刘的住宅也受到冲击，他便乘机吞没存放家中的艺专公款八千元，捏词呈报教育部说公款全数被劫，无法赔垫。

〔18〕 火神庙 在北京琉璃厂。旧时每年夏历正月初一至十五庙会期间，设有很多临时性的古玩玉器摊。

〔19〕 “打落门牙” 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北京民众五万余人在天安门集会，反对当时在北京开幕的“关税特别会议”，主张关税自主；会后游行。但赴会群众刚进至新华门前，即遭大批武装警察阻止和殴打，致引起冲突，群众受伤十余人，被捕数人。次日，《社会日报》等作了与事实不符的报导，说鲁迅曾经参加，并被警察打落门牙两个。